

东北亚论丛第三辑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主 编:刘中树 王胜今
副主编:李玉潭 张宝仁

东北亚地区 和平与发展研究

投资环境与经济发展



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

第八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李 玉 潭

由中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主办的“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第八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8月7日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举行。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以及来自中国的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参加了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向大会提交了近6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教授致开幕词，国家教育部社政司阚延河副司长到会致辞。此外，韩国代表、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也分别致辞并向研讨会表示祝贺。吉林大学池元吉教授做了题为：“机遇与挑战：东北亚国际经济环境剖析”的基调报告。

本次研讨会的讨论主题是：“东北亚区域投资环境与经济发展。”围绕这一主题，有19位代表做了大会发言，12位代表做了自由发言，就东北亚各国投资环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亚洲金融危机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与地方政府作用以及东北亚各国间投资和贸易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和建议。

一、关于亚洲金融危机与东北亚区域经济环境和发展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正确认识亚洲金融危机是正确把握和估计东北亚经济环境现状的关键所在，是讨论东北亚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主要是因为：发端于1997年7月份

的泰国金融危机,后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已波及亚洲各国甚至整个世界。作为东北亚国家的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害,俄罗斯目前也已陷入危机之中,而中国也正在饱受人民币贬值压力之苦。因此,要推动东北亚地区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就必须深刻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教训,这已成为与会代表的共识。会议代表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一种由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危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和政府战略决策的失误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有的代表指出,由于东北亚国家过度依赖自由度大而且难以控制的国际短期资金来弥补大量的经常性收支赤字,埋下了诱发危机的隐患。有的代表精辟地分析了直接投资在弥补经常性收支赤字上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旺盛的直接投资会加剧生产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如果外资企业生产出口出现缺口,则可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最终不得不依靠国际短期资本来弥补,这就使实行外资依赖型工业化路线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陷入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本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性质来看,与会代表认为它是本世纪以来继 1929 年金融危机之后又一次波及面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经济破坏性最大的金融危机,而且已经由金融危机发展成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它表明东亚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和结构性大调整时期,是高速经济增长中产生的各种弊端的一次大调整。关于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问题,代表们观点分歧较大。有的代表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宣告了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终结,是“东亚模式”的危机,是制度性、结构性危机。有的代表则指出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东亚模式”造成的,也不意味着“东亚模式”的破产与终结。“东亚模式”最本质的特征,一是政府在经济起飞中的支撑和控制;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原则是符合东亚国家国情的,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也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东亚模式”出现问题不在于其模式本身,而是由东亚政府调控系统的缺陷和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的。与会代表在分析东亚金融危机时,指出了它对东北亚区域经济的

严重影响,并明确提出东北亚区域局部经济环境在恶化,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潮流下,东北亚区域长期环境是向趋于改善和良好方向发展的。这种辩证的分析既能使我们正视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又能使我们对其对之不失去信心,也能使我们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

二、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地方政府作用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本次国际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就这一问题代表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指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因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地区和平与稳定制衡机制的脆弱性和各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使其建立主权国家紧密型的区域集团的条件尚不具备,以局部经济圈的地缘优势和互补优势为基础的地方国际经济合作将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有的代表经过详细的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在东北亚各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地区间、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已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其交流与合作已从构想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出现了交流领域扩大化、经济合作具体化以及人员交流频繁化的新局面。有的代表明确提出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初级阶段,地方政府的战略重点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挥地方政府职能,改善经济合作的社会环境;确定通商秩序,完善区域经济合作的市场环境。有的代表以图们江开发为例,详尽地论述了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出了阻碍地方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阻碍因素,其中包括开放体制的不对称、缺乏涉外事务处理能力、法律环境不完善、金融体制不健全、相互关系不紧密等。有的代表则指出东北亚合作的组织与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应当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设立“东北亚各国的地方间经济合作组织”。当前可以首先着眼于在局部经济圈内设立地方政府合作组织,按照环海经济区、沿海国际经济开发区、内陆沿边合作区和城市合作区来操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建立全区域性质的地方政府间

的合作组织,形成多层次的地方政府合作推进体制,这是实现从沿海到沿边乃至城市的全方位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保证。有的代表指出,通过各国、各地区间的努力合作,完全有可能摸索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路子,创造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同时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上看,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东北亚各地方政府,应为实现这一区域合作的目标而努力。

三、关于跨世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与会代表对跨世纪的东北亚区域合作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有的代表指出,开放的地区主义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特征,直接投资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则是推进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许多代表对区域内投资和多边或双边贸易进行了系统分析。有的代表指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给中日双方带来了巨大利益,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但也指出了日商投资方向与我国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中间技术取向未能得到充分实现的问题,并客观地分析了令日商感到顾虑的中国某些行政环境和法律环境。关于中韩经贸关系,有的代表指出,自中韩建交以来双方经贸合作发展十分迅速,中国已成为韩国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对象国;但两国经贸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韩国国内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正在蔓延和升级,双方交流企业信息不足,中方贸易逆差较大,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项目技术层次不高,这些问题还需要双方做更大的努力加以解决。有的代表也分析了俄罗斯吸引外资的新动向,指出俄罗斯1997年在改善吸引外资的宏观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远优于联邦政府的规定,从而使1997年成为俄罗斯吸引外资最多的一年。同时提出了要拓宽我国与俄罗斯的合作领域,特别是加强信息产业的合作与投资力度。

此外,许多代表还就东北亚区域专项合作进行了广泛探讨。有的代表从研究开发国际化角度论证了优化东北亚研究开发合作

的环境问题,明确指出研究开发国际化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阶段。还有的代表提出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环保型农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出环保型农业不能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需要实现区域性合作;推动东北亚区域和平与发展,不能忽视作为绿色产业的农业方面的合作。还有的代表从区域劳动力资源的分析入手,进一步论证了区域劳动力资源共享问题并对未来中国劳动力开发和利用提出了建议。有的代表则从东北亚区域文化角度探讨了东北亚区域发展问题,指出东北亚文化具有多元性,同时论证了其矛盾性并提出了在文化多元性和矛盾性基础上求得文化的共识性。凡此种种观点,丰富了东北亚理论研究的内容,把东北亚理论研究推向了更广泛领域和更深层次。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机遇与挑战： 东北亚国际经济环境剖析

池元吉

一、周边环境：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前景的基本看法

当前亚洲经济环境的基本形势是笼罩在金融危机之中，除中国等少数国家外，整个东亚面临经济萧条的困境。对这次金融危机怎么看，其影响和前景如何，这是正确估计东北亚经济环境状况的关键所在。

首先应该指出，这次从1997年7月初泰铢大幅度贬值引发的迅疾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和东亚的金融风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现在看也确实是本世纪以来继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一次波及面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经济破坏性最大的金融危机，至今尚未结束，某些方面甚至还在恶化。这次金融危机已不再仅仅是金融危机，已发展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就是说，最初的危机表现为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股市暴跌和金融企业的破产，而后进一步发展为企业效益下滑、出口下降，大批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倒闭破产，企业大幅减员，失业人口增大，国内消费低迷，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整个经济明显呈现出萧条、危机的兆头。在金融和整个经济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国内矛盾加剧，居民对现政府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日增，导致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日本等国更换执政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威信下降，出现了政治危机。虽然疾风暴雨式的袭击各国经济和政治的危机形势已经过去，但其消极作用和影响还将延续数年，东亚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和结构大调整的时期。这无疑将使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环境

和投资环境受到影响,特别是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两个主要资金供应国的日本和韩国,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受到的打击和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更加恶化了东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

但是,不能因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而对东亚经济前景产生悲观情绪,看不到东北亚经济的光明前景。

(一) 不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东亚模式”造成的,也不意味着“东亚模式”的破产和终结

“东亚模式”最本质的特征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政府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增长中发挥强有力的支撑和调控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发挥更大的替代作用,即东亚国家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另一个是,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引进外资和技术,培育发展面向出口的产业,通过扩大具有比较利益的出口产品改善资源的配置,获得贸易利益并推动经济发展,即东亚国家推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从原则上说既符合东亚国家的国情,也符合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东亚国家最大和最普遍的国情是原有经济基础落后,同先进国家的经济差距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它们要想摆脱经济落后、受人欺凌的地位,必须加速经济发展,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先进国家,实行“赶超战略”。而要赶超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培育和完善市场上的作用,就必须给予企业更多的指导、支持和扶植,就必须引进自己短缺的资金和技术,就必须培养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外向型的支柱产业。从世界发展趋势来说,在凯恩斯主义问世和1929年大危机之后,所有国家都否定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实行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即西方国家所说的“混合经济”,或我们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战后以来,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社会分工超出了国家范围,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分工,出现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使各国的资源、技术有了共享的机会,与之相适应,绝大多数国家摒弃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实行了对外开放。这些情况说明,“东亚模式”没有错,也谈不上终结和破

产。实践也证明,正是在“东亚模式”下,才有了“日本奇迹”,才有了步入“新兴工业国”行列的亚洲“四小龙”,才有了东盟国家、中国的振兴。“东亚模式”功不可没,也没有过时,也不应因这次金融危机而动摇。

(二) 在肯定“东亚模式”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是尽美尽善、完美无缺的,也都是必须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不能僵化

世间没有尽善尽美和不变的事物。这次金融危机比较充分地暴露出了东亚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给总结“东亚模式”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改善、完善“东亚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国家存在许多问题,每个国家存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从总体上看,从政府责任的角度上看,起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府系统本身存在缺陷。一个有效率有权威的政府,既是行政能力很强的政府,又必须是自律性很强的政府,缺一不可。东亚国家的政府多为集权的政府、强人的政府,因而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一般说都是比较高的,但是缺乏自律,缺乏法制,因而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腐败行为日益泛滥,导致决策和行政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日本“金元政治”、韩国“政治黑金”暴露出来的种种丑闻,苏哈托家族对印尼经济的垄断,泰国官僚政府与房地产商人的勾结,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政府比较廉洁,因而也比较高效,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比较小,采取的对策也比较有效。

二是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不仅要建筑在政府的廉政上,还必须建筑在政府决策的正确性上。东亚各国政府过去许多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因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在近些年来的经济转型期,一些决策是错误的,有些是滞后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泡沫经济问题上。泡沫经济从日本开始不断向外蔓延,成了东亚各国经济的普遍现象。在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

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高新产业迅速发展,使东亚各国现有的钢铁、纺织、家电、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的出口受阻,出口下滑,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外汇储备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未能及时推出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政策,只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扩大内需是对的,但是,政府又没有将投资更多地引导到加强基础设施和高新产业上,而是更多地流入到证券和房地产投机等虚拟经济的领域,形成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便在作为市场经济中枢和血液的银行系统里形成了巨额不良贷款和呆账,暴露了金融体制的弊端,引起了经济的混乱,而政府又未能及时拿出良策予以解决。这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和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说明“东亚模式”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而只能说政府行为有严重缺陷。因此,不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根本制度或体制的危机,而只是高速增长中产生的各种弊端的一次强制性的大调整。

(三) 经过这次金融风暴的洗礼,各国政府将更加清醒,必将采取大刀阔斧的政府措施推行社会经济改革,从而使“东亚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和国际新形势

事实上,受这次金融危机袭扰的国家都在调整战略和经济结构,特别是都在制定金融管理规则,并已初见成效。同时,在应付这次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更加意识到了增强地区内国家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彼此支持的政策措施。例如,1997年7月泰铢汇率大跌后,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起对有关国家提供了援助。日本迄今已通过IMF框架为泰国、韩国和印尼提供了27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中国不仅对东盟国家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而且出于减轻金融危机中受害国的金融、出口压力和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不惜承受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巨大压力,宣布并一再重申维持人民币同美元的现行汇率不变,即人民币不贬值。1997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温哥华会议期间,各国与会代表一致强调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解决金融危机的首要办法,并通过了在九个部门提前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加速经济技术转让等内容的共同宣言。1997年12月的东亚首次非正式首脑会晤,其中心议题就是加强合作、共同克服金融危机,中国、日本和东盟国家为此发表了共同声明,东盟国家还宣布彼此间的贸易暂以本国货币结算和设立东盟外资基金,以缓解美元紧缺和外贸困难的压力。可以预见,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的经济体制将更加健全,经济实力将更加增强,地区内部之间的经济合作将更加紧密,东亚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世界环境:对当前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基本认识

上面谈的仅是东北亚局部的国际经济环境问题,或周边的经济环境问题。由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东北亚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地区,因此,看其国际经济环境不能只看其周边环境,还要看到整个世界的经济环境。我认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世界经济环境是好的,有利于东北亚经济发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以下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一) 近几年的许多指标显示,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增长期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世界经济(GDP)增长率,1995、1996、1997三年分别为3.7%、4.0%和4.2%。1998年预计为4.4%。在2002年以前全球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可望达到4.5%。这就是说,整个世界经济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率将超过70~80年代。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8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4%,1980~1990年为3.2%。90年代头3年,世界经济处于低谷,从1994年起开始复苏,现在正处于平稳增长阶段。就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苏东转型国家这三大块来看:1. 经合组织(OECD)的28个成员国即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大都处于成熟阶段,现在除日本等少数国家之外,都处于平稳增长状态,预

计1998年将同1997年一样,经济增长率在2.7%左右。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经济发达国家的两大支柱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势都比较好。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特别自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经济保持了低失业、低通胀的经济增长状态,而且在高新技术上特别是信息产业发展上势头很强,被世人称作进入了“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由1990年的1.3%上升到1997年的3.8%。这种势头还可能持续保持下去。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力 and 火车头,它的经济状况良好,必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欧盟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如美国。欧洲经济增长率自1991年以来,除1993年曾达到3%以外,都是在3%以下,而且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从1997年起也出现了好转的势头。1996年为1.7%,1997年为2.5%,1998年也可能达到或超过这一增长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欧盟一体化在不断取得新进展,虽然受到英国阻挠,但从1999年1月1日起将发行欧元,实现欧洲单一货币。欧洲单一货币的实现,会给欧洲经济注入活力,会增强欧洲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同时,欧元作为硬通货出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也很可能对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2. 由亚非拉127个国家构成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势头较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6.5%,1998年由于东亚经济增长下滑,但总体上还可能达到6.2%,除东亚国家由于金融危机的袭扰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外,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拉美和非洲经济增长明显加快。经济改革也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通货膨胀率下降,整个经济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拉美和非洲国家在改革产权制度、关税制度、外汇管理制度和银行制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使它们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较快增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多,为它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和更雄厚的物质条件。

3. 苏东转型国家在经历了90年代前半期经济连年大幅度下降之后,近几年经济普遍回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资料显示,原苏东地区的

经济增长率1996年为0.1%，1997年为1.8%，1998年预计为4.1%。俄罗斯经济由于受国内财政金融状况恶化的影响，1998年的经济形势不会很好，但东欧国家特别是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经济都出现了稳定增长的良好形势。总之，国际经济大环境总的说是好的，对东亚地区走出困境是有利的。

(二) 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步伐加快

这是国际经济环境改善的最突出表现。首先，贸易自由化从战后1947年建立关贸总协定时就走上了制度化阶段，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自由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发达国家工业品平均关税削减到低于4%的水平，许多国家已采取措施开放服务行业。这对推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经合组织曾做过这样的预测：1992～2005年，如果没有乌拉圭协议推动的贸易自由化成果，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将为2.9%，世界贸易年增长率将为4.1%；如果实施了乌拉圭回合协议，世界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将为3.5%，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长率将为5%。实践证明这个预测是有道理的。1995年1月1日正式运转的世界贸易组织，又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非货物贸易纳入到多边规则之中，扩大了多边自由化的领域，并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都有了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有力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其次，在投资自由化方面进程更为突出。《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90年代以来，政府之间签订的保护和促进投资协定的数量大大增加，截止1996年6月，世界158个国家间共签订了近1 160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1995年一年就签订了172个。”也就是说，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个投资协议签订。《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1991～1996年间各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一共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宽限制的。这表明世界各国投资政策的目标是趋向自由化，各国政府都在争相减少投资限制，提供投资保护，提高优惠条件。正是在这种投资自由化的潮流下，国际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

告》的统计数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平均1 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 468.2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支撑点。1991~1996年,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0%,国内生产总值为3.4%。这就是说,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率速度最高,国际贸易次之,国内生产总值最低。这说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环境是很好的,是很有利于东北亚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吸入外资来发展经济的战略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和宽松的投资软环境。

(三)大国间关系调整与改善的趋势明显增强

十分明显,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中,美、欧、日、俄、中等几个大国或地区的关系最为重要,它们之间关系的背向可以说决定着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因此,观察国际经济环境的好与坏,不能不重视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大国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是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1997年以来,中、美、日、俄、德、法、英等国首脑频繁互访或热线联系,成为国际间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而且,在大国首脑互访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几乎都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作为目标。例如中美之间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之间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之间提出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美俄、俄日都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德之间要成为两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俄法之间要成为“优先伙伴”,建立“特殊伙伴关系”等等。在不同制度国家之间或过去敌对国家之间主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发展中的崭新事物,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表明各大国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和世界走向多极化、多元化的今天,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为了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取得最佳位置,必须努力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必须把对话、协商作为解决彼此间矛盾和分歧的唯一途径。毫

无疑问,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的稳定,有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有利于国际投资环境的改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所有大国都把发展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美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和参加者,发展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是它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之一。欧盟国家也十分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1997年2月举行的首次亚欧外长会议,突出地强调加强亚欧两大洲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会后正式成立了亚欧基金,两洲之间的经贸关系有了很大发展。还应指出,中国作为东亚的大国,既把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也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作为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中国执行的睦邻友好和不断扩大开放的政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将对东北亚地区走出金融危机、再创“东亚奇迹”起着重要作用。

三、长期环境:对经济走向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上面我们主要是对国际经济环境现状的看法。这里不妨再对长期国际经济环境和走势做一些分析。

历史即将告别20世纪,跨入21世纪。在这个世纪转换的时候,人们对未来世界抱有种种期盼和预想。一个最为普遍的共识,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个结论不仅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基本走势,也反映了一个以战争、军事对峙和争夺领土为特征的旧时代的结束,一个以国际协调、国际经济竞争和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主旋律下,世界经济出现了信息化(知识经济化)、全球化两大趋势。这两大趋势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汇合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左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企业的未来前途和命运,促进世界经济向前发展,改变未来世界的面貌,也将给人类带来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

(一)信息化是世界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发展的大趋势

所谓世界经济信息化,就是由现代信息技术、信息设施、信息网络等组成的信息经济,从城市到农村、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开发、扩散和普及,信息产业成为先进国家进而成为世界的主导产业,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又提出了社会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是一个意思,是从不同角度说明人类将进入高科技推动的以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为主导的社会。信息和知识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知识是信息的泉源,信息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本身就是信息,信息本身也是知识。信息是知识的开发、搜集、传播的过程,知识也是信息的创造开发、利用、加工的过程。知识的有效用就在于它成为信息,信息的价值在于它的知识含量。信息和知识是一种无形资源,它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 信息和知识渗透到一切生产要素和一切经济活动中,使生产要素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最优化的组合,最大限度的节约。美国杂志《外交政策》1995年秋季号载文说:“20 年代的开创性产品——汽车,是由60%的能源及原材料加40%的技术和知识构成的。而90年代的开创性产品——计算机芯片,则是由2%的能源及原材料加98%的思维、技术和知识构成的”;2. 信息和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可以不断使用,永不损失,其收益可以递增;3. 信息和知识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具有流动性的一种,它不受地域、国别等空间限制,也不受运输上的时间局限,可以通过各种传媒手段超时空的直接流动。这些特点使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加快速度的强大武器,从而开辟人类发展的新时代。

信息和知识的地位和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了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美国1996年12月30日《商业周刊》载文认为,从80年代起美国经济已进入“新经济”时期。所谓“新经济”主要就是指信息和知识经济。现在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与信息产业相关的产值已经超过GNP的50%,美国已有

2/3的工人从事与信息相关的工作。

(二)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大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

1992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中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应该说从有了世界市场和机器大工业的时候就开始了。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不承认边界的扩张性经济,机器大工业本质上就是进行国际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就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不过,直到二战以前,甚至80年代前,由于科技水平和经济规模的限制,由于运输、通讯手段的限制,也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限制,经济全球化还局限在一些领域和一些地区。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运输通讯工具的现代化;随着跨国公司和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发展,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频繁化和广泛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的普及;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经济运行规则和机制的国际化,一切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在加速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成了世界经济的细胞和有机组成部分,各国经济的运行规则在统一、机制在接轨,真正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来临了。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状况可以从下面的数字中看得十分清楚:过去40年间,世界生产增长了5倍,而国际贸易增长了14倍,国际贸易占世界生产的比重从7%上升到21%;最近20年,年度国外直接投资从25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即增长了12倍以上。

对国际经济关系来说,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意味着什么?1. 意味着商品、货币、资本、劳务、科技、信息、人才等一切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流动和不断转移,从而为所有国家利用国外资